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〇期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1d)

【研究思考】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	天 穹
【史海钩沉】	“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王 锐
【重建历史】	周恩来为何七鞠躬向贺龙骨灰认罪	姚监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思考】

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

• 天 穹 •

在“九一三”事件四十一周年之际，人们多么希望林豆豆向人民、向历史做一个坦诚的交代，她毕竟近七十岁了，时不我待。但是，《林豆豆口述》的出版，却使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经过反复阅读《林豆豆口述》，及多次走访了解林豆豆的人，笔者发现，有三个“关系”，是林豆豆“思想体系”的基础；她的思想认识和她的所写，都是以这三个关系为基础的。这三个关系是：（1）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2）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3）叶群和林彪的关系。因此，弄清搞准这三个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关系弄清搞不准，是很难研究清楚林豆豆所讲述的具体问题的。

笔者认为林豆豆讲的这三个关系，都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够真实的。

一、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

1935年，叶群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与王光美是同班同学。叶群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比王光美早参加革命十年。她也有“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的青春（上图左起：林立衡、林彪、林立果、叶群）之歌。1938年，叶群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秘书、编译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60年恢复军籍后曾授上校军衔，这是与其能力、资历基本相称的。总之，叶群是有她自己的革命经历的。

实事求是地说，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不好，大部分的责任在林豆豆。据说，这种关系不好，最初来自于严慰冰的恶毒攻击的匿名信。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污蔑林彪一家，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关系，说林豆豆不是叶群所生。林豆豆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内容后，对她打击很大，开始到处寻找她亲妈，搞得林家不得安宁，也严重影响了病重的林彪（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恨不得一枪毙了陆定一，也说明林家受害之深）。生长在这样的革命家庭，林豆豆是不应听信谣言的，豆豆的无知、不冷静实属不智。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刘源说，严慰冰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少奇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还特意到过中南海刘家，看她和刘平平长得像不像，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严慰冰的恶劣行为，不仅伤害了叶群，也污蔑了刘少奇。林豆豆听信了谣言，在家里绝食、闹腾。豆豆闹到什么程度？据叶群亲弟弟叶镇说，一天叶镇接到林豆豆的信，信中说：“舅舅你快来看我呀，我实在精神上受不了了”。叶镇夫妇赶到中关村豆豆住处（此时林豆豆在上大学），豆豆抱住叶镇就大哭说：“舅舅呀，你一定快点找到我的亲妈！”叶镇很生气，说：“豆豆呀，你不能再闹了。这是阶级敌人的陷害！”这也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叶群不是林豆豆亲妈，叶镇还是亲舅舅吗？

其实，林豆豆的行为对叶群这个母亲来说伤害最大！叶群明明是林豆豆的亲妈，但为了林豆豆早日摆脱精神折磨，她还是想尽办法找到知情的警卫员、马浮(8)舫等等，连接生婆都找到了，都找来给林豆豆作证，其实这毫无必要。叶群完全可以说，我就是你亲妈，你再胡闹，随你去吧。叶群这么做，是对林豆豆的迁就和溺爱，不愿林豆豆感情上受伤害。

林豆豆仍然无理取闹，叶群给了她一巴掌，不能说对，也不能算什么大错。叶群本来就是你亲妈嘛！严慰冰的案子破了以后，叶群就“更是”林豆豆的亲妈了。但林豆豆并没有感到愧疚，也没有向母亲道歉，她是知错不认，自己下不来台，反而变本加厉地说叶群的坏话。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为了“保护”林彪，把叶群说成是欺骗林彪出走的祸首，把她和叶群的关系也从家庭内部问题，演绎成她一直和叶群欺骗和控制林彪斗争的政治对立关系。林豆豆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不正确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叶群不是你亲妈，也有养育之恩，也要善待！这就是林豆豆的不孝和任性之处。其实叶群对林豆豆是溺爱的，她在无奈的痛苦中给豆豆起了个外号叫“豆老爷”。林办的秘书认为这个外号很贴切，连林彪有时都扯着嗓子、拖着湖北腔叫“豆老爷”（当然这是林彪对女儿的昵称）。

说叶群对豆豆溺爱，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给她找对象。林豆豆说叶群给她找对象是为了控制她，这纯粹是胡说。你找到了真心爱你的夫君，他能听命于叶群控制你吗？事实证明，张清林从“九一三”事件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听林豆豆的。在此，话不多说，一言以蔽之，在叶群的眼里林豆豆就是女儿，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控制的，林豆豆的说法是自我拔高。据切实了解，林豆豆是早熟的。在那样的年代，在帅府之家，父母要把女儿的婚姻关，应不为过，何况她自己渴望的人或自己交往过的人都是不太适合的。在文革中，叶群四处托人为林豆豆找对象，从政治影响上看确有不妥之处（关心林豆豆的人很多，巴结的人也不少），但从母爱角度来说，叶群是尽心的。

另一个是“九一三”事件。9月12日夜晩，在叶群、林立果携林彪紧急出走时，不见林豆豆。其实，周恩来一来电话，叶群就知道林豆豆“惹事”了，但叶群还是坚持要找到豆豆一起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豆豆已经反叛，但去意已定的叶群还是舍不得丢下自己的骨肉，这是母爱使然。

第三个是林豆豆上大学的经历。豆豆中学在师大女附中，是63级（即1963年高中毕业）。《林豆豆口述》110页写到，她自己“16岁就开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并因此多次休学”。但她却在1962年中学未毕业就提出要上大学。叶群想办法，送她到清华（在自动控制系，与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一班）。刚好1962年中央明令规定，高干子女上大学不许走后门。那个年代，大家都严格遵守，如刘帅的女儿，仅差一分就没能上哈军工而上了北航；贺龙当年气势正盛，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他的儿子贺鹏飞上了清华，但上了录取分最低的机械系就很满足。豆豆提前一年“毕业”，没经高考就上了清华，而且上的是高录取分的自动控制系，可想而知，叶群作为母亲下了多大功夫，担了多少风险！而且，叶群怕豆豆吃苦，不让她住校（那个年代所有高干子弟都住校，和普通人家子女打成一片），专门找人在中关村给豆豆安排住宿，保姆王淑媛陪着照顾豆豆生活。豆豆跟班上学很困难（跟不上，严慰冰对她的迫害也是原因），后来又改上北大，结果转到北大也难读下去，只能辍学肄业。1965年到空军参加工作，定为干部，授少尉军衔。看来，不能说叶群对豆豆不好，而是好过头了。豆豆在《空军报》工作，叶群知道豆豆经常在外采访而耽误吃饭，很着急，但林彪这样的帅府家庭毕竟不太识“人间烟火”，有些不知所措。当她知道商店里有高价点心出售时（不要粮票），亲自去买了点心，装在一个铝饭盒里给豆豆送去。

第四个是，叶群时时关心林豆豆和林立果的生活。林彪身体很差，消耗了叶群很大精力，但她很关心这两个孩子。林彪、叶群一年之中，很长时间在外，每次外出，她都让其弟弟叶镇夫妇来毛家湾照顾豆豆和林立果。

总之，把叶群说得再“坏”，她对待林豆豆并不坏，而是关心和忍让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林立果因林豆豆石破天惊的报告引起中央警觉而由周恩来询查，使叶群乱了方寸而“仓皇出逃”，殒命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已过去四十一年，快半个世纪了。林豆豆最不该的是，她不但不自责，还出书编假话诋毁自己的母亲。而且对“九一三”事件，林豆豆毫无反省，也没有给林彪正名的具体行动；四十一年来，毫无建树。现在可好，出了一个《林豆豆口述》，不但伤害了林彪、叶群，也伤害了真实的历史，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谷底。

其实，在老干部的夫人们中，叶群在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方面是超前的，知识也是不错的。比如她懂俄语，这是苦学而来的。报刊多次登过叶群翻译的文章，如1948年9月21日就登了一篇叶群翻译的《必须要学会总结经验》（克·希达列夫著）；她练毛笔字（赵孟頫体），也是下过功夫的。1962年6月3日，她署名叶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古代一位优秀战略家——陆逊》的文章，不仅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分析得很到位，还提出富国、强兵、爱民是克敌制胜的根本，这样的水平在高级干部的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叶群常请人给她讲课，汲取各方面知识，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夫人做不到的。

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一是林豆豆写得不实；二是她们关系的好坏，也左右不了什么政治大事（“九一三”除外），林豆豆把自己看得太高，太重要了。

我们研究一个人，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判断和认识。叶群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是能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顶尖人物近距离接触的人，我们要在这个范围内衡量叶群才有意义。

因此，这里想厘清林豆豆和叶群的关系，并不是要做个判官来判定他们母女之间的是非恩怨，而是想揭示出叶群的基本面目。不能对其“妖魔化”，因为这种基本面的“妖魔化”，是要影响对叶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为的判断的。

二、林豆豆和林彪的关系

林豆豆是林彪家人，但家人并不等于就是林彪政治活动的“当事人”。豆豆往往用含糊的概念“我们”二字，把自己涵盖进林彪的工作中，以及林彪和党的领导人、高级干部的交往中来。在把“家人”置换成“当事人”后，就绘声绘色、“亲临其境”地论述政治大事。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早就对林豆豆习惯性地用“我们”一词提出质疑。罗点点深有体会地说，林豆豆和人谈话的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的问题不做正面回答，……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好像是指她和林彪”。林豆豆是1944年生人，她谈政治上的“大事”，常常从1964年说起。那时她才20岁，还在上学，对于林彪、叶群、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叶剑英、肖华、杨成武等等革命前辈来说，林豆豆应该不在她说的“我们”之中；对于“很多林办秘书”，“全体林办秘书”来说，豆豆应该也不在“我们”之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陷阱：你不相信吧，她是林彪的女儿；你相信吧，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豆豆和林彪就是父女关系，可是在林豆豆口中，他和林彪的关系几乎上升到“亲密战友”的关系，某某事“我和林彪的看法是一致的”，某某事“我和林彪都不知道”。林豆豆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中的行动，就是以林彪亲生女儿的身份，作为共产党员代表他，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咐的”。究竟林彪“在病重时”对林豆豆的嘱托是什么？不得而知。林彪既然病重，不向中央报告，不向军委嘱托，不向军委办事组嘱托，而向林豆豆嘱托，这绝不符合林彪的党性原则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林豆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拿王淑媛来印证她的话，或者说她的话是从王淑媛那里听来的，因为王淑媛是能接近林彪的。王淑媛原来是幼儿园的阿姨，后调到毛家湾来工作。我们并不否认她是一位优秀可靠的共产党员，但她的工作性质就是公务员（保姆）的工作。她并不负责照顾林彪的生活，林彪的衣食起居也不归她管，林彪的生活有李文普为首的警卫人员管理。林彪和党内、军内领导同志谈工作，王淑媛是绝对不可能参与其中的。林彪是极为严谨的人，是不会对王淑媛说什么的，她连秘书办公室都没有进去过，是不可能知道什么大事的。当然，王淑媛生活在毛家湾，林彪、叶群讲过的只言片语，王淑媛是可能听到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如果把王淑媛听到的只言片语作为林彪对某个重要问题看法的依据，是绝对错误的。林豆豆常抬出王淑媛，只是她的障眼法而已。

据林办秘书介绍，林办秘书根本没有给林豆豆讲过什么“公事”、“大事”。“林立果回家来，还爱到办公室走走，打听一些消息；林豆豆很少来办公室，也不打听什么消息。”其实林豆豆讲从林办秘书处得到的如何如何之事，大都是自己从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而已。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林豆豆是林彪家庭的一员，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的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的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三、叶群和林彪的关系

文革后，官方为了维护毛泽东，把毛和江青切割。林豆豆为了护林，也机械地仿照；如此这般地切割，结果适得其反。江青在文革中的作为，总体上无疑是和毛一致、和毛有关的。但

江青有独立的工作（如文艺、宣传、中央专案等），有大量独立的讲话，这些工作和讲话未必毛泽东事事都知道。叶群没有中央分配的独立的工作，她的工作几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联（上图：林彪与叶群）系人、军委办事组和林彪的联系人。叶群不参加军委办事组办公，江青必参加中央碰头会或政治局会议，而且是这些会议的主角。叶群在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林豆豆恰恰看错了这个基本点，或者说为了给林彪开脱（其实完全不必开脱什么！），故意编造了林彪和叶群关系假的“基本点”，说他们的关系就是叶群对林彪的控制和欺骗。

关于叶群参加中央工作的缘由，更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那样。这怪不得叶群。叶群参加中央碰头会、军委看守小组（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进政治局等等，现在看来“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另一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有必然性），并不是叶群有“野心”就能当得上的。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去分析研究，不能因为林彪、叶群是“坏人”，就讨论叶群这样的“坏人”应不应该有如此政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不但党和国家的命运由毛泽东决定，就是每个高级干部的荣辱褒贬，也在毛泽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掌控之中。

其实，军委办事组（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稳定军队、加强战备、苦撑危局、支持总理工作、反对江青一伙等等重大问题上是有正面作用的，叶群在林彪和办事组之间也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比如，在对待江青的态度上。从黄、吴在中央碰头会时期，到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时期，他们对江青是知表不知里的，对江青的底细是不清楚的。虽然他们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不满，也是不敢太过分的。但叶群对中央文革不满，对江青一伙不满，林彪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不满，叶群是坦现在黄、吴、李、邱面前的，这样势必使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斗争有了底气。黄、吴、李、邱对中央文革和江青一伙的态度，叶群当然会及时告诉林彪。应该说军委办事组对中央文革、对江青一伙的斗争，黄、吴、李、邱是有功的，叶群也是有功的。

再比如，叶群知道更高一层的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对重大事情的态度，把信息传给黄、吴、李、邱，不但对军队工作本身是支持和帮助，就是对黄、吴、李、邱在文革复杂混乱的局面中把握好一些问题的界限和分寸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在这点上，黄、吴、李、邱也是感激叶群的。

林彪和叶群的关系，绝不是林豆豆说的“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的关系。叶群有时为了林彪的身体，不得不推却或私下处理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有所谓善意的“欺骗”。但绝不是路线问题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对林彪欺骗，更不是为了毛泽东所愿而欺骗林彪。林豆豆说叶群对林彪欺骗和封锁等等，只是林豆豆十分幼稚的为了“维护”林彪找托词而已。

林彪曾在毛家湾当面骂过江青，掀了茶几。这正说明叶群没有对林彪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问题上误导林彪。这个例子，说明叶群对林彪不是欺骗和控制关系，叶群从没有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思想来影响林彪。

林彪更不是动辄骂人的人。陶铸危难时，林彪也只能说“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才是林彪式的语言，既含蓄又明白。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号称第四号人物。陶铸和林私交很好，但陶铸的命运完全抓在毛手上，江青、陈伯达又不肯松手。在这种局面下，林彪不可能保陶铸，只能用“被动、被动、再被动”这样看似含混实则明确不过的“林彪式语言”来告诫陶铸。毛

泽东最后还是抛弃了陶铸，抛弃陶铸时还拿陈伯达来打掩护。

林彪和陈再道既不是一个“山头”的，平时也没有个人情谊和私交。因此，林彪怎么可能在“七二〇”事件上破口大骂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呢？更不可能对陈再道有明确的支持和张扬的表现。《林豆豆口述》31页写到：“林彪气得发抖，说：‘……说陈再道想害主席，胡说八道！’”“林彪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煽动群众……主席为什么不离开武汉，他多次说大家不要怕接触群众，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接触一下群众？他出来接见一下群众，就不会出这场事了嘛！’”同一页林豆豆还写到，林彪因毛泽东在武汉有男女关系问题大骂毛，“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不能跟着他去丢丑。”这段话，显然是用现在林豆豆的观点代替当时林彪的观点。文中还有不少错误。其一，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林彪应该知道；其二，毛泽东并不是怕死不敢见群众的人，中央（当然包括林彪）劝毛离开武汉是为了保证毛的安全；其三，“七二〇”事件并不是因为毛泽东迷恋女人引起的；其四，林彪是不会支持陈再道的；其五，林彪是绝不会谩骂毛泽东的；等等。林豆豆在此与其说出了毛泽东的丑，不如说大大伤害了林彪。林彪是慎言的人，连邓小平都说过：“林彪不爱说话，我认为都是他的优点”。因此，我们说林豆豆笔下的林彪是不真实的。

平心而论，叶群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联系斡旋，与周恩来的联系沟通，与黄、吴、李、邱的联系沟通，做了很多努力；为了适当、适度让林彪掌握情况，得当地出席会议和公众场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就是叶群在文革中的主要工作。因此，叶群的态度和走向，上对林彪、周恩来，下对军委办事组，都至关重要，是应当肯定的。

不管叶群思想水平怎么样（中共最高层的夫人里，她应是上乘的），工作能力如何，她在文革中做的具体工作产生的客观效果不小。例如：

1．八届十一中全会，她是坚决反对林彪回来参加会议的。叶群1970年讲过此事。她原话大意是“回来干什么？回来就得表态，这个态不好表……”

2．文革初期她是极力保护军队老干部的，像保吴法宪、李作鹏、李天佑、王秉璋、赵尔陆等等，还冒着危险抢救过几乎被造反派揪斗至死的邱会作。虽然这是林彪的决定，但是叶群不认真执行，这些老干部也是要吃苦头的。

3．在1967年，在军内是反党委、反党委领导，还是保党委、保党委领导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拥护党委、拥护党委领导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上，在稳定军队还是搅乱军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叶群立场坚定，在“五一三”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对稳定军队是有功的。

4．叶群在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方面，也是有功的。

5．反对中央文革，和黄永胜、吴法宪责骂江青，惹出李必达事件。李必达事件反映了叶群对中央文革和江青的真实态度，有林彪的一点影响，但基本思想是叶群本人的，这也是不简单的。

6．看了《邱会作回忆录》，知道周恩来总理和叶群在1970年极力支持邱会作儿子邱路光和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女儿的婚事，也是一种对文革的叛逆思想。张霖之毕竟是毛泽东、江青都点过名，称其为“走资派在座就有”的人。

总之，叶群在文革中，对稳定军队，反对军队造反，反对江青插手军队，反对江青的代理人在军队的活动等方面，是有功的。这是历史事实。

就林彪和叶群个人关系来说，纯属家庭私事。但林豆豆硬是杜撰“叶群对林彪是控制和欺骗的关系”，本文不能不说几句。

在夫妻关系问题上，林彪对叶群是很有歉疚的。文革前林家是最清静的。林彪从不交友，生活单调，身体不好不出门，生活上对叶群依赖很大。叶群是很愿意参加工作的。解放初，她曾在教育部普教司任副司长，林彪的具体生活由工作人员照顾。有几次，工作人员给林彪冲藕粉冲不好，林彪吃不下，影响了身体。周恩来亲自给叶群说，照顾林彪同志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工作。这样，叶群不得不脱离地方工作岗位，专职在家照顾林彪。多年后，叶群半开玩笑地说：给101冲藕粉，就是为党工作。所以，叶群平时也难得出门。文革中叶群有机会到战友、部下家看望，见到别人家里的“生活气息”很浓，非常新鲜，非常感慨。林彪从来不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请客人吃饭。文革前有一次陈毅来访，谈完事，开朗、豁达的陈老总说：今天就在你家吃饭喽。林彪却说，和我吃饭那有什么油水呀，饭没有吃成。

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林彪曾给叶群写下“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的条幅。这是林彪1970年5月1日题给叶群的，落款为“书赠战友叶群 林彪”。这说明至少在1970年5月以前，林彪和叶群政治上是一致的，是感情至深的。林彪不是一个会作秀的人，没有感情，不会对叶群写出这么真挚的话语。1970年5月以后呢？这离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在蒙古温都尔汗“死同穴”仅为一年。这一年，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日益紧张的一年，叶群和林彪应当是风雨同舟的。

1970年5月17日，江青找黄、吴、李、邱谈话，造成黄、吴去主席处告状，邱去周恩来处汇报，林彪、黄、吴、李、邱对江青的不满摆到了毛泽东面前。之后，有吴法宪在宪法问题上跟张春桥的争论，有庐山会议毛林交恶公开化，有毛泽东“抛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给黄、吴、叶、李、邱下政治结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直至毛泽东南巡等等，不必多说。这样从时间上排排队，说明叶群并没有在哪个时间段和林彪根本上不一致，形成对林彪的“欺骗和控制的关系”。所以林豆豆杜撰的林、叶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林豆豆旨在为林彪辩诬，想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

总体来说，林彪、叶群的确是“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九一三”事件，叶群死于非命才52岁。

四、无知不是理由——林彪不需要林豆豆式的护短

林豆豆为了给林彪护短，搞出个耸人听闻的“打针、吃药”说。《林豆豆口述》19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为什么在他不知道和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我曾质问过叶群，叶群倒在自己的卧室里吞声抽泣说：‘上边的人’决定的，知道的，是通过组织的……不给他用这些药，按他自己的思想和气质讲话，行事，他马上就要同主席对立起来……”。92页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次上天安门参加所谓‘检阅’和集会讲话时，由于事前30分钟之内被强行注射了据说是外国最新的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的剧毒药物”。1

48页写到：“林彪在他不知道用什么药或他极力拒绝的情况下，总是被强行注射了最新进口的剧毒药品。这些药片连林彪的保健大夫也不清楚，我多次问他们，他们也不敢说……”“林彪被注射药品后，令人奇怪地突然‘精神’起来，与用之前，从精神状态到言语，判若两人”。林豆豆还写到，给林彪打剧毒药品，叶群明知道也无可奈何，“流着泪说：‘上边的人’决定的”。

林彪的上面还有谁？非毛泽东莫属。林豆豆给出的答案告诉人们，是毛泽东逼迫林彪打进口剧毒药品，打了针就“与用之前，从精神状态到言语，判若两人”，“能向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感情和思维”，这样林彪就讲了错话，办了错事。

这是林豆豆式的护短，可是林豆豆又不会护短。林彪不需要这样幼稚的护短，遮住了这头又亮出了那头。

众所周知，不要说林彪这样领袖一级的人物，不要说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就是一般的群众，看病都有医生签名的病历和签名开出的处方。文革期间毛家湾的保健医生有蒋葆生、王子敬两位，他们都否认这个天方夜谭。林彪的治疗都有严格的规定，严格的记录，都是专人负责，专人领取，这是有据可查的。据切实了解，发到林办的林彪用药，都是封有火漆印、有专人签收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林豆豆说，“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剧毒进口药品”。那么试问：充满哲理的“林彪式”语言，也是打针后的胡说八道吗？林彪对中央文革、江青一伙的斗争，甚至当着江青掀茶几，叫江青滚，也是打针后精神失态所为吗？林彪文革初期指示军队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评说：不介入是假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反对解放军机关造反夺权，要求稳定军队，要求加强战备等等，林彪指示黄、吴、李、邱支持周总理工作，也是打针后的呓语吗？《林豆豆口述》的出版，搅得是非颠倒！

资深摄影师孟昭瑞所著的《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记述了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情景：“检阅开始，就听见林彪在喇叭里对广场大声嚷嚷着：‘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上图：1966年9月5日，周恩来看林彪修改发言稿）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嘶哑的声音在广场上飘荡，带着阵阵寒意。以往重大的讲稿都是事先拟好的，但这次非常不同。当毛主席来到城楼大殿，我看到林彪马上把讲稿拿出来请他审阅。无疑，这次林彪的讲话毛主席十分重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并让林彪对其多处修改。林彪坐在毛主席旁边指着讲稿向他解释，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对讲稿进行修改，周总理也在一旁帮他字斟句酌。林彪改罢稿子，又指着改好的地方，请毛主席再次过目。这一系列动作，都被我用照片定格下来。”。

孟昭瑞的著述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例证。文化大革命都被彻底否定了，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人孰能无错？林彪在文化革命中，至少在文革初期不能说是没有错误的，应该进行事实求是的研究、论证，并要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相比较来分析。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角度看来，官方认为毛泽东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总理说过了违心的话，办了违心的事，不参与具体工作的林彪却被说成犯了罪。这显然是非历史的，是政治说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那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邓，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面前不攻自溃，表示“永不翻案”，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是一般群众，他们应是坚贞不屈、

英勇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在应该被彻底否定的文革面前，在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巨大浩劫面前，没有进行抵制斗争。

在《林豆豆口述》118页中写到，“当林彪听到贺龙同志病逝时，不禁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都不开了？！’”也是毫无必要地向某些人递送秋波。

有些事情我们还记忆犹新。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周恩来在4月14日大会发言时着实对林彪夸奖了一番，此后林彪即席讲话。林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切胜利和功劳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林彪特意提到贺龙，说，“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说此话时林彪伤心地呜咽起来。林彪这个发言是4月14日，而贺龙是6月9日去世的。怎么仅一个多月，林彪就判若两人，为贺龙鸣起不平来了？林豆豆哪是为林彪翻案，而是告诉人们，林彪是个两面派。

贺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完全应该平反！在文化革命中，贺龙被打倒的责任主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江青，林彪有责任也是个配角而已。林豆豆完全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文过饰非。不过，从当时毛泽东和刘、邓斗争的情势来看，贺龙和刘、邓，和彭、陆、罗、杨打得火热；在批刘时，贺龙自己都说“上纲上不去”。贺龙的问题在深化，毛泽东表示不保了，关键在于所谓“通敌问题”。关于所谓贺龙通敌问题的信，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专案组，并交代要认真看。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有记述：“大概在六六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

1974年9月29日，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对在文革中给贺龙立专案问题做出如下解释：“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1974年林彪早死了，而毛泽东、周恩来都还健在。如果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搞的，与毛泽东、周恩来无关，上面的解释就毫无意义了。其实，在贺龙的问题上，贺龙的家人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不拟提及。

《林豆豆口述》145—146页中说，“1962年到1966年，林彪多次对全家人说：‘彭真关于吸取党的历史教训，胸怀旷达，不念前嫌，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你们都要把彭真同志、杨尚昆同志当作学习榜样。’并多次给我和叶群、林立果题词：‘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还叫我把题词压在玻璃板下经常看。”直到杨、彭先后被打倒，林彪竟然还说：“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坚持不让林豆豆拿掉题词。

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生前解放了很多老干部，但不包括彭真。彭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老干部都解放后，最后一个解放的，可见中央对彭真的解放很久才达成共识。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这个决议

批评了彭真的错误，此前，彭真已被免去东北局书记一职，降为副书记，后又调往华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聂荣臻元帅第一个揭发彭真在华北的错误，聂帅说（大意）：有些错误是彭真搞的，他栽到我头上，我都准备带到棺材里去了，毛主席英明伟大，揪出了彭、陆、罗、杨……。

林彪在著名的“五一八”讲话（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彭真说：“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藉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也严厉地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在1966年6月下旬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总书记。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难以相信与彭真没有私人往来、对彭真“党内搞党、党内搞派”“也有感觉”的林彪，突然会对家人提出“向彭真、杨尚昆同志学习”，而且“他们垮了，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而在于林豆豆为什么此时要把这样的话拿出来？是乞求！林豆豆写这封信是1980年3月，此前即1979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彭真“东山再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接下来就主持公审。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下课，所谓毛派势力一扫而光。林豆豆此时想告诉公审的主将彭真：我爸爸林彪还说过你好话呢！试问林豆豆是不是也被打了毒针改变了思维？这是给父亲身上抹黑，还是为父亲脸上添彩？

《林豆豆口述》117页到118页，还提到汪东兴九大前生病一事。这是1969年春天的事，林豆豆误记为“约1969年秋”。林豆豆绘声绘色地写到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娥“对叶

群和我放声痛哭说：汪的病，就是为‘他们一家’活活累的……汪这次突然大出血，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说要是你们救了他的命，‘人家’将来就会要你们的命。所以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和总理，怕你们和总理担风险。”

林豆豆身临其境，没有任何人能否认。但如果汪东兴家人说林豆豆造谣，林豆豆也不能证明她不是造谣。而以下情况也是确实的：此时汪东兴的夫人姚湘峨还不认识叶群，叶群的到来使姚湘峨很感激。姚湘峨是“很识时务”的老干部，面对着非常拥护毛泽东的林彪夫人，不知其内心态度，就对伟大领袖大发一肚子怨气（“人家”就是指毛泽东、江青），姚湘峨不怕掉脑袋吗？叶群对姚明显露骨的挑拨言语，敢“一拍即合”吗？另外，汪东兴的医疗关系和组织系统与军队毫无关系，汪东兴怎么会说“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如果北京医院有医疗问题，报告周总理是可以的，找叶群有何用？何况当时北京医院的医疗水平高于解放军总医院（301），且北京医院就掌握在汪东兴手上，何人敢怠慢？所以，林豆豆所讲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汪东兴九大前确实生病了。但叶群看汪东兴的用意，林豆豆没有搞清。九大以前，叶群就参加了军委办事组，对军队的事已经涉入较深，了解较多，但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还了解不深。汪东兴则相反，对中央的事和毛泽东的事知道较多，对军队的事基本不了解。过去叶群和汪并无私交，这次汪病了叶去看望，正是互相接近的机会。汪生病，毛主席不可能亲自去看望；叫江青去，江青摆架子不肯去，叶群一下子就钻了进来。叶群去看汪，黄永胜、吴法宪也去看了汪，后来黄、吴、叶、李、邱又一起去看了汪。这些军中大佬生性豪放，热情洋溢，汪东兴受宠若惊，竟有些忘乎所以，他为了讨好叶群竟脱口说了一句：“是不是有些卸磨杀驴呀？”汪说后马上自觉不妥，又有意收回说：“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主席竟让我参加碰头会，真是对我的信任。我工作做得不多，还病了。”叶群很聪明地说：“你这么想就对了！”叶胜了汪一筹。

这就是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走得很近的开始。汪东兴不是拿骂毛泽东为代价靠近黄、吴、叶、李、邱的，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汪东兴的心态。从此叶群、黄、吴、李、邱为汪东兴办了很多事，如汪的子女当兵等等，对汪东兴是有求必应。汪东兴为了讨好黄、吴、叶、李、邱，在汪东兴家，在三座门（军委办公所在地），就讲了不少毛泽东的家事，虽然多是骂江青的，但也涉及不少毛泽东个人的隐私，有些活动林豆豆、林立果和黄、吴、李、邱的子女也在场。看到汪东兴和黄、吴、叶、李、邱交往的情况，就很容易解释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坚决拥护林彪讲话，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揪人”的表现，以及叶群为什么在林彪8月26号去毛泽东处开会时叫林极力保汪（甚至摔了一跤）。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汪东兴是信任的。九大推迟开，主要是因为汪病了，毛泽东说：“汪病了，要等汪好了再开。”九届二中全会汪跳得最高，毛主席还是保了他。就汪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忠臣，而是脚踏两只船。当汪东兴知道毛泽东真正不想要林了，他又回到毛泽东这边，轻巧地检讨把责任推给陈伯达，毛泽东就让他过关了。从此，他与叶群再也没有私人来往。1971年关于毛泽东要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事，汪东兴没有为叶群透一点信，叶群一检讨就被毛主席劈头盖脑地批了一顿。毛泽东去世后，尸骨未寒，汪东兴又去主谋参与抓“四人帮”，不知毛泽东在九泉之下怎么想？他老人家号称洞察一切，却没有看清汪东兴的内心。粉碎“四人帮”后，黄、吴、李、邱最为高兴，其政治生命本应有所转机，但汪东兴却极力主张把黄、吴、李、邱押送秦城，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林豆豆口述》中，也多次提到毛泽东的男女关系问题及林彪对此的痛恨态度，甚至家里的保姆王淑媛（？！）也知道毛泽东的男女关系并对毛大发微词。林豆豆自以为爆料新奇，把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借着林彪之口发泄出来了。这与其说是对毛泽东的鞭笞，不如说是对林彪的极大伤害。过去污蔑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林豆豆又对自己的父亲污蔑了一遍！应该说林豆豆既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林彪，更

不了解毛泽东和林彪真实关系。毛泽东并不是沉迷女色、贪色误国的昏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林彪也不是反对毛泽东的“英雄”，虽然林彪看到文化革命中的许多问题，看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他对文革的极左路线、对江青一伙的祸国殃民有意见，感到担忧。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林彪的意见，反而说林彪是反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甚至诬陷林彪抢班夺权，从而紧紧威逼。最后南巡煽动反林，把林彪逼到在国内无立足之地的地步，直到付出身家性命，造成惨死温都尔汗的结局。毛泽东的确是很对不起林彪的。即便如此，似乎也不能说林彪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毛泽东和林彪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革命历程，革命情谊，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业，足以不朽。林豆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父亲塑造成是反毛泽东的先驱，因为林彪不是！

林彪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但并不是林豆豆所说的错误，更不是打毒针造成的错误。有位了解关心林豆豆的老同志说：“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帅府千金抖出几个“鲜为人知”的“猛料”，就能改变历史的。林豆豆为父亲辩诬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哪些林彪做对了，哪些林彪做错了，哪些林彪要负责，哪些林彪不负责，她并未搞清楚。希望林豆豆努力呀！东隅已失，桑榆非晚。

如果林豆豆是对林彪热爱的、负责的，就应当努力学习，认真思考，潜心研究。比如说在文革中，林彪哪些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的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和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因为本文不是研究、探讨、指证林彪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故不在此展开论述。

有人说林豆豆爱说假话，不是为了造假，而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林豆豆为什么爱说假话，姑且不去探究，但她爱说假话是事实，很多人有同感。林豆豆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必定是局面不可收拾。一个假话说不圆，又编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接下去，编造了一份林家的虚假历史，把林家的群像画得面目全非。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样的事谁也帮不了她，只有林豆豆自己来面对。四十年来，时过境迁，林豆豆本身就是一个天涯沦落人，早已是“寻常百姓家”。但强烈的虚荣心使林豆豆一直对社会卖关子，好像她手上有什么高深的东西、重要的史料，能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能解开水革之谜。大家还是丢掉幻想吧，经过努力，千千万万的研究者会远远走在林豆豆的前面。

正所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原载余汝信主编《“九一三”回望》，2013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

~~~~~

【史海钩沉】

“文革”初安东将军之死及其风波

• 王 锐 •

1966年5月下旬，正当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风云初起之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将军，突然“非正常死亡”。

安东之死，当即在中央高层引起某些震动。首先，安东是“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军方第一个死于“非正常原因”的高级将领。而且其真实死因，一直显得扑朔迷离。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安东之死”，很快成了一个特殊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风波，数年未息。

#### ◇ 将军清晨突发意外

1966年5月21日清晨，北京下起了小雨。这是那年夏天，首都北京难得的凉爽天气。

8时许，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办公室里，突然铃声大作。平时清晨这个时候，难得有电话打进来。一般下属，以及国防科委众多机构与单位负责人，知道聂帅作息时间。也知道聂帅这一阵都在参加中央重要会议，无暇他顾。

值班秘书赶忙接听电话。没料到，拿起话筒一听，里面却是个未脱稚气的女孩子焦急的声音：

“叔叔，我爸爸突然发病，快不行了，你赶快来！”

值班秘书一愣神，立即听出，这是住在隔壁的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安东将军家，安东的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位值班秘书，此前曾经就做过安东将军的机要秘书。对安东一家老少，他都熟悉得很。

其时，安东的家与聂帅的住处，仅是一墙之隔。安东既是聂帅的老部下，而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帅，又直接分管国防科委。由此，聂安两家，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平时生活上，都常有往来。

放下电话，聂帅这位秘书，急匆匆赶过安东那边，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一进安东将军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情景却让他惊呆了。

据这位秘书后来对聂帅，以及中央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反复讲述的所亲眼目睹的现场情景：

当时，办公室里，安东将军单腿跪在地板上，一只手勉强扶着办公桌，另一只手里还握着电话，半瘫倒在那里。该秘书走过去一看，发现安东将军脸色惨白，嘴唇乌紫，整个人已昏迷过去。

见此情形，很像是突发心脏病的症状。

救人要紧。聂帅这位秘书顾不得多想，就和安东女儿一起（当时现场仅有他两人），手忙脚乱地将安东抱起来，小心放到旁边的一张藤椅上躺下。

然后，该秘书又立即用电话，与北京医院专门为高干服务的“危重病人抢救组”联系，请他们赶快派医生过来急救。

安排好这些事，这位秘书才几步跑回聂帅住所，向聂帅作紧急报告。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

这时，聂帅已吃完早餐，正在漱口，准备稍事休息即出门。没料却听到秘书关于安东病危的报告，聂帅当即也愣住了。

安东是聂帅的得力部下和助手，从中共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开始，跟随聂帅多年，彼此相知甚深。听了秘书的报告，联系到前不久安东发现心脏病的事，聂帅最初也认为，安东可能是心脏病突然发作。

又听说已通知北京医院派医生来，聂帅连忙对秘书，和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一名男护士吩咐说：

“你们不要管我了，去照顾安东要紧。赶快把这里的氧气筒先拿去抢救。切记，在医生没到之前，不得离开，也不得停用氧气。”

聂帅秘书与那名男护士立即拿着氧气筒赶去，一面给安东输氧救治，一面焦急等着医生到来。其间，安东一直昏迷不醒，病情继续恶化。

急救电话打出去大约20分钟后，北京医院抢救组的有关专家匆匆赶来，并展开紧急救治。其主要的抢救措施：一面注射强心针，一面采用人工呼吸（后来在中央决定设立专案组，就安东死因展开专案调查时，北京医院这几名到过现场的专家，也受到反复盘问和调查）。

然而，当时安东的情况很严重，呼吸很差，心跳也逐渐微弱下来。半个钟头后，其呼吸，心跳竟然全部停止，且瞳孔散大，呈现死亡征象。

到9时40分，负责抢救的医生只得正式宣布抢救无效，安东将军已溘然去世。时年仅48岁。正是最年富力强的年龄。

◇ 此时已是“多事之秋”

这段时间，中国正处于“文革”大动乱前夜的特殊时期，中央高层政局，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气氛紧张的态势。

奉毛泽东指示，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专门解决所谓“彭罗陆杨”问题，并就开展“文化大革命”等相关问题，作一系列决定和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是，此次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批判，以及关于“文革”运动的一系列决定。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的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决定》。5月18日，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19日和20日，彭真，陆定一作了检查。之后，彭罗陆杨四人被撤职停职。

此时的聂荣臻元帅，本想远离这种复杂多变，令人望而生畏也望而生厌的高层政治。他一直呆在上海，一方面是检查几个军~科研所的工作，另一方面，也顺便在医疗条件不错的上海华东医院，检查已患多年的心脏病。在沪期间，却突然接中央办公厅通知，让其返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想以身体为由，暂缓返京赴会，却没获批准。

聂帅只好临时中断视察，及拟议中的身体检查，于5月7日提前回京。返京后，还是休息了两天，于5月10日起开始，连续出席火药味很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望着被批判揭发的彭真，聂帅不禁思绪万千，感慨难言，背上冒出一点冷汗。他也不免有点暗自庆幸，大约10年前，自己当初的决定“正确无比”，没有选择去当坐镇京都的北京市市长。否则，眼下坐在那里接受批判揭发的，就可能是自己，而不是彭真。

原来，自1953年在代理总参谋长任上晕倒离职，休养治疗三年后，195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他谈话。

邓小平在询问了聂帅的健康情况后，说，对聂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聂帅自己选择：一是决定陈毅专搞外交，陈分管的科技那块由聂来抓。二是彭真工作太忙，中央想让彭真免兼北京市市长，北京市长一职，由聂帅接任。三是让聂帅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当即表态，他不想当北京市长，而是愿搞科技（见《聂荣臻回忆录》下册）。

从邓小平这次找聂帅谈话，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央（主要是毛泽东）就有过将彭真在北京的权力予以限制或分权，以缩小或削弱其势力的想法和考虑。主要是不想让彭真势力在北京日渐坐大。可惜由于当时聂荣臻不肯接招。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一直到文革前，彭真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这种地位，没有变化。也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格局。

当年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之所以打算选聂帅来接替彭真出任北京市长，一是因为，中共接管北京政权之初的1948年起，聂荣臻就出任过当时首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以及第一任北京市代市长。其次，聂荣臻不是当时北方局或华北山头的人。

但聂帅深知“天子脚下”的京都市长不好当，他也不愿太深地卷入，其时已经初露端倪的政坛之争，所以他选择了相对冷门的分管科学技术工作。

5月21日这天，按原计划，聂帅本来打算按时赴人民大会堂开会。聂帅得到安东病逝的消息，既觉突然，又哀痛无比。不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不容耽误，此时已是“非常时期”。10时左右，他仍强抑悲情，准时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 ◇ 共和国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安东，原名安振成，1918年出生于四川阆中。此系三国时期，蜀中名将张飞的故里。

安东1955年被授与少将军衔时，年仅37岁，是当时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年仅30多岁的年轻将军之一。

安东1932年（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5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因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又小有文化，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秘书。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入党。

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安东历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处副处长，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执行处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处长，四野43军129师参谋长等职。

共和国成立后，安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第一副局长。

其后，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因赏识安东的才干，将其调任来

总参谋部，作了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此时的安东，还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

据聂帅的老秘书刘振杰回忆：“那时，在总参谋部这头，聂荣臻实际上有4个秘书，唐永健是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是聂荣臻的主要秘书，从晋察冀时代就跟着他了，长期担任华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另外3个秘书是王甲义、刘振杰、柳鸣，都是年轻人。”

刘振杰还说：“后来聂荣臻办公室还是觉得人手紧张，就把安东调来担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

应当说，安东是个很称职的办公室主任。不仅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思维敏捷，而且头脑清楚，办事细致。不管有多忙，每样事情，总是井井有条，处置得当。同他共过事或打过交道的人，都十分欣赏安东这种杰出的办事能力。

#### ◇ 聂帅深为赏识的得力助手

当时，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是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来到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聂总办公室在东侧，作战室在西侧，中间是会议室。一进门，他总是先直奔西边的作战室，首先听取值班参谋报告，一般性的电报、战报、文件、电话记录都是当场处理。然后，他才来到东侧自己单独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安东已提前半小时，将必须在当天处理的各种文件、电报等整理好，并分门别类地放在聂总案头，等待聂总处置。聂荣臻开始办公时，安东就退出，回自己办公室处理其他各类大小事务。聂总随时有事，总是按电铃叫他，安东闻声即来。聂总需要办什么事，习惯将要处理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安东，通常是一张纸条记一件事。安东按字条办理，简便利落，效率很高。安东这种办事水平和效能，深为聂帅所赏识。

在安东已去世20来年的80年代，聂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在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时，仍颇有感触，满带缅怀之情地谈起安东的这种能力：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来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的作战文电、各种情况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一一向我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713页）

朝鲜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非常紧张，作为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工作量极大，他自己说，在此期间，“是我一生最繁忙的时期”。终于，1952年9月的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

经检查，聂荣臻心脏及血管、神经方面都有问题，需要彻底治疗。经中央批准，聂荣臻于1953年初暂时离职治疗休养，总参的工作由栗裕接替。

聂帅离开总参后，推荐安东出任总参装备计划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时，安东授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年轻将军之一。



以后，聂帅分管国防科研工作，安东再次成了聂帅的得力助手。

1956年4月，为发展“两弹一星”，中央批准成立负责导弹航空科研的领导机构“国家航空委员会”，由聂帅兼主任。聂帅就将安东调过来，让安东出任“航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实际主持“航委会”日常工作。

1958年，经中央批准，又将“航委会”与国防部五部合并，正式成立国防科委。中央任命聂帅任国防科委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能干且懂行的安东将军，被赋与重责，出任国防科委秘书长。

“文革”前，安东已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且，是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在国防科委领导班子中，安东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聂帅。安东将军生前，对发展中国大陆国防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中国大陆涉及国防建设及现代化的一切机密（包括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安东无不参与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心血。安东此时的军阶虽仍是仅少将，但对中国国防建设的实际作用和地位，比许多中将，上将，重要得多。

正因为如此，也为日后将“安东之死”政治化、复杂化，埋下了祸根。

#### ◇ 死亡原因成“政治问题”

5月21日，安东将军去逝当天，聂帅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回到住处，对当前时局发展的忧虑，和对安东猝逝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受到心情极为郁闷。

据其秘书回忆，5月21日那天晚间，在坚持每天的例行散步时，聂帅边走还边对身边的人感叹：

“安东年纪轻轻，又喜欢体育运动，既会打乒乓球、网球，又爱滑冰、游泳、经常锻炼身体，健康状况一直挺好。不久前说是患有心脏病，所以我让他到杭州来，跟我住一起，休息了10多天。前几天，他还几次来陪我散步，好好地，怎么这样突然就去世了，真是可惜！”

周围的人听了，也无不感慨叹息。然而，当天晚上，情况突变。

大约晚上11时许，聂帅正在院子里遵医嘱作睡前散步。此时，负责安东将军治丧活动的总参谋部管理局，派副局长姜严俊来到聂帅住所。

姜严俊副局长奉命向聂帅报告说，北京医院关于安东的尸检报告，已经作出。该尸检报告的结论是：安东并非死于心脏病，而是因其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镇静药“眠尔通”，导致中枢神经麻痹而死亡。

而且，据医院专家检查，安东将军仅有轻度心脏病，不致猝死。

聂帅听罢，大吃一惊。他似乎不相信这个结论，站住脚，连连向姜严俊副局长问了几次：

“这尸检报告是否正确？”

姜严俊均予以肯定地回答。

对此，聂帅沉默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有闷头散步。姜严俊看聂帅心情不好，赶紧告辞。其他人也不敢作声。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晚上，聂帅个人一直闷闷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比平时多走了10来分钟。

第二天早饭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给聂帅送来关于安东死亡的正式的尸检书面报告。聂帅锁起眉头，从头到尾仔细阅过，证实了昨晚姜严俊所说的结论。

阅毕，他又将这份尸检报告再看了一遍，陷入沉思。好一阵，聂帅才恢复平静，当面对罗舜初将军，认真交待安东治丧活动的有关安排，以及应注意的事项。

这天，聂帅心情更加不好。为此，还破例推迟了两个小时，才去人大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事实证明，聂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其时，正处于“文革”风云初起的非常时期，安东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5·18”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杀气腾腾地说中国有人要搞“政变”。由此，中央高层气氛骤然紧张，许多领导感到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一个有着大军区首长高级军方职务，又掌握着我国国防尖端机密情报的负责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当即引起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层的重视。

中央有关领导对此研究后作出决定：安东丧事活动照常进行，内部则展开调查，弄清安东“非正常死亡”的真实原因。

不过，据知情者后来透露，当时调查的主要方向，是查清安东将军之死，存不存在“他杀”（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或情报机构暗害）的可能。

#### ◇ 康生插手列为“绝密”专案

7天后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的通知，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以后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了权势极大的特殊机构。

众所周知，康生是一个靠整人起家，以搞专案整人为乐事的“专家”，40年代在延安整风时期“抢救运动”，整了一大批人。60年代又先后炮制“刘志丹小说专案”、“杨献珍专案”等，迫害一批党的领导干部。

窃据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大权，康生为显示自己作为党内“情报专家”的本~和资格，首先就拿安东死亡事件做文章。

正当有关方面在对安东死因进行调查，暂时未有结论之际，有一次，在有周恩来等中央高层出席的中央会议上，康生突然发难，提出“安东是不是有国际背景”这样有点耸人听闻的问题。

康生所谓的“国际背景”，意指（甚至怀疑）安东将军在任期间，是不是同苏联方面有某种可疑的联系？当时，中苏交恶已久，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极度恶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苏联”沾上边，即可能遭怀疑，甚至展开特e调查，惹祸上身。

而安东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苏联方面的一些部门机构和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交道。康生抓住这一点想做文章，其用心非常险恶。

这次会议下来，康生又专门找到聂帅谈话，说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个很严重的“特殊事件”。还一口咬定，其间“可能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要列为“绝密专案”，展开调查。并说，中央已决定此案的调查，改由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侦办。康生还以中央领导层的身份和口气，要国防科委对公安部专案调查“积极配合”。

在那时，不管什么样的人 and 事，只要一列为“专案”，即表明政治上有问题，而且性质严重，在“左”思想倾向指导下，没有问题也可能弄出问题来。康生打着“中央”的旗号，将安东死亡事件，列为“专案”。聂帅对此不无忧虑。

对于安东这位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几十年出入生死，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为发展国防科研的贡献，聂帅是深有了解，且十分信任。对这样一位富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重要将领，竟然成了公安部侦查的“特殊专案”的怀疑对象，这点让聂帅及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许多人，都惑然不解。

不过，“专案”既然是中央定的，聂帅及其他领导也不便多说，只好静等调查结果。聂帅等多数了解安东的人，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证明安东的清白。

#### ◇ 造反派突然大字报发难

然而，没等公安部和国防科委的联合专案组调查，弄出个结果，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在国防科委内部，就围绕“安东死亡之谜”掀起了一场大的风波。其锋芒所及，最后竟牵到聂帅头上。

进入1966年8月，中国“文革”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提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接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陈伯达、康生等“文革小组”大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个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受这种“文革”思潮影响，8月23日，国防科委一些人，带头造反，用大字报形式，将本身属于内部机密的“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捅出来，公之于众。

这份张贴于国防科委大楼的大字报，以典型的“文革”造反派语言，无端指责安东之死，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行为”。大字报作者进而发挥，诬指安东为革命的“叛徒”。同时，该大字报还扬言，要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揭开所谓“国防科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云云。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犹如一枚重磅炸弹，顿时在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一些人对此持激烈反对态度，认为安东之死，尚属党内机密。况且，中央关于安东死亡问题的指示精神，也要求保密。大家就更不应该就此随便贴大字报。于是，反对者当晚趁夜深人静，将此大字报揭下并立即销毁。

国防科委机关内部，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为此展开激烈辩论。

贴大字报的那些造反派及其支持者认为，贴大字报是“四大”，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予的权利，对方撕毁大字报，是反对“四大”。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动行为”。

而揭撕大字报的那派群众则认为，这是保护国家机密的“革命行动”。同时，指责对方有意将这些“作为党和国家机密”的事情捅出来，公之于众。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应当批判。

两派为此争议不休、互不相让。以这一事件为起因，也是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干部群众，后来分裂成观点严重对立两大派的导火索之一。

#### ◇ 聂帅仗义执言保护安东

国防科委内部这份搅乱局势的“大字报事件”，开始时，聂帅并不知情。以后两方越闹越凶，争斗越来越激烈，聂帅才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聂帅为平息争斗，也为保护去世的安东，于8月底专门召集国防科委领导，当面指示说，关于“安东之死”，组织正在调查。没有正式结论前，此事不应在大字报上公开。要给群众做工作，说服他们并设法平息争论。

后经国防科委领导多方努力，终于让这一“大字报事件”暂时平息下来。

9月12日，聂帅专门来到国防科委，听取部份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国防科委机关内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现况和种种问题，作情况汇报。汇报中，又有人提到安东问题。

聂帅深知此言不善，对此明确表态说，你们说安东平时不突出政治，这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看不是事实。几句话将那些人说得面面相觑。

在那种非常时期和政治气氛下，聂帅如此为遭到遭到造反派攻击，且处于专案调查对象的安东将军仗义执言，明辨是非，是很难得的。

也由此，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江青等人整几个军委老帅时，“中央文革”那些人和造反派攻击批判聂帅，将这次表态讲话作为聂帅“包庇安东”的主要证据。

“安东之死”被列为专案后，聂帅从根本上不相信安东会有什么“政治问题”，更不相信康生、谢富治等人说安东有所谓“国际背景”，甚至里通外国。

因此，为澄清事实，他也很想实事求是地弄清安东的真正死因。

不过，国家公安部当时受康生、谢富治等控制，聂帅无力过问。

为此，聂帅指示国防科委负责人，以及参与调查的相关人员，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弄清事情真相。既对死去的安东负责，也对其家人负责。

聂帅这番告诫，对保证“安东死亡案”调查的正常开展，起了很关键作用。

## ◇ 死因调查扑朔迷离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逐渐得知，在安东猝死前几天，也确实有一些值得重视和思索的情况。

专案人员调查得知，5月21日安东服药去世之前，大约一周左右，国防科委办公室，曾给安东送来几册“文件汇编”内部资料。这是关于国防科委机关总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在机关内部所谓“民主生活会”上，给几位主要领导提的“意见”的综合汇报。

这份汇报资料显示，其中，对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提的意见较多，也较尖锐。

当然，这些针对安东的意见，主要是一些关于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如说安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对待下级，爱训人，爱发脾气，处理事情也比较主观武断等等。

然而，其中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立场观点，比较严重的是这样一条，有人认为，安东将军“不突出政治”，甚至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可以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无疑，在“文革”运动风潮乍起，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普遍都对此感到不安和自危的情况下，这些带有揭发性，批判性的材料，对安东将军，肯定构成了某种政治压力。

特别是联系到经毛泽东点头认可，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那么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段话，可以说让当时中国好一大批干部（包括军方领导）都感到惶恐不安。

安东见到那几本文件汇编中，对自己问题的披露（尽管是“民主生活会”），又联想到《五·一六通知》中那咄咄逼人，份量非同一般的警告性言辞，其内心肯定比较紧张。

而且，聂帅后来还了解到，在安东去世前不久，某些领导曾经把国防科委这些年来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将责任全部推到安东头上。尤其是，安东猝逝3天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因“三家村”问题受冲击的自杀辞世，消息震动北京及中央高层。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文革”运动，安东的处境及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过，凭聂帅多年对安东的了解，其一贯精明能干，思想活跃开朗，这点谈不上多少实质内容的“问题”，似乎还不足以让年富力强的安东走上绝路。

而且，专案人员的调查及现场勘察情况也不支持“自杀”为死因。

首先，自杀者多半会做好充分准备，及留下“遗嘱”之类。而安东将军却没留下类似“遗嘱”的东西。

其次，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者，一般会卧于床上，安静辞世。而安东将军被发现昏迷时，是在办公桌前，一只手还手握电话话筒。这不象是一个立意自杀辞世者的模样姿势。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安东那一阵心情不好，夜眠很差，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导致不幸。

这种情况，过去也曾经在某个高干身上出现过，只是由于发现得早，抢救及时，才没导致悲剧。

当然，对于聂帅来讲，也找不到安东之死不是自杀的足够理由和证据。不过，他相信一点，就是安东无论如何不会有“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聂帅才有9月12日在国防科委汇报会上，被认为是“包庇安东”的一番讲话。

随着“文革”的深入，局势更加混乱，运动锋芒以及斗争矛头，指向性也越来越宽泛，被揪斗打倒人物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国防科委内部，两派斗争加剧，安东死亡事件，反倒成了次要问题。

康生亲自布置的“专案调查”，也由此不了了之。

#### ◇ 聂帅再次挺身而出为安东作结论

然而，1968年以来，全国又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帐，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并再设“专案组”，组织人马，展开全面调查。

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几十年人生，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

所谓“安东之死”的“专案调查”再度搁浅。

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可另一方面，却给安东将军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

为此，安东将军的爱人李树坚，给聂帅写去一封信，要求正式为安东作出组织结论。希望聂帅能过问一下此事。其时，聂帅尽管也因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1968年“杨余傅事件”，而被列为“犯错误”的高级领导人，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长期打入“另类”，处境比较困难。但他仍本着负责的态度，给国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做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聂帅在信中，有意仍称安东为同志，这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是需要点不惧邪恶的胆魄和勇气的。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

再以后，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官方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应当说，这种写法也非事实求是，其也有隐瞒历史真相之嫌。

□ 原载《共识网》

~~~~~

【重建历史】

周恩来为何七鞠躬向贺龙骨灰认罪

• 姚监复 •

我1980年代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同纪登奎有过多次谈话，他主动地向我们讲过一些他的“文革”经历和史实。

纪登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一办管高级干部，二办管军队高级干部，三办管公检法干部及“五一六”专案。因此，纪登奎有权力有资格查阅党的绝密档案。

纪登奎曾经告诉我，有次他去西山的党史档案馆，查阅贺龙的档案资料，看完材料出来时，浑身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中央专案组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定案材料，把贺龙定为“叛徒”。但是，在档案馆里保存着国民党派人策反贺龙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贺龙向上边的请示及答复，贺龙枪毙说客的决定等材料。纪登奎的意思是，证明贺龙并非叛徒的原始档案完整地保留在档案馆里，他亲眼看到了、读过了。但是周恩来负责的贺龙专案组，仍然要将贺龙定性为叛徒。他从档案馆出来，想一想这样处理贺龙元帅，令人不寒而栗，惊出一身冷汗。

纪登奎原来不知道，后来才看到了保存完好的贺龙档案，震惊万分。而长期处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周恩来，肯定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证明贺龙不是叛徒的原始档案就在北京西山，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定一清二楚。但是，为了适应“文革”的形势，适应毛泽东要求打倒贺龙的要求，周恩来主管的中央专案组认可贺龙专案组的结论，报送毛泽东，将贺龙定性为叛徒，致以死命。

周恩来在这个惨剧中不仅是“违心的”，而是直接动手修改、审定贺龙是“叛徒”的专案组的报告的冤案制造者和杀害元帅的刽子手之一。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在1975年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说：“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他”。这是对家属、对舆论和民情所作的表演，推脱责任的演戏手法。而他面对贺龙骨灰的七鞠躬，则是周恩来受到良心谴责，为自己明明知道原始档案可以证明贺龙不是叛徒，但是却亲自把贺龙从中南海家中送入虎口，并且以贺龙专案组名义定性为叛徒，置之于死地，这是自己一生中又一不可饶恕的罪孽。向骨灰七鞠躬，是认罪，是祈求贺龙饶恕他的丑恶卑鄙的灵魂。周恩来这一招能骗过不少世人，但骗不了贺龙，也骗不了纪登奎，他看到档案后浑身冰凉，因为他发现了周恩来也是陷害迫害贺龙的当事人，掩盖真实史实的伪君子。

当然，他对我没有这样明白地讲出来，他多次以“愚忠”形容周恩来这个人。但是，把陷害说成“没有保护好”就不仅是“愚忠”了，而是伪君子。当然，这不仅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毛泽东培养的那一代领导人和许许多多高、中、低级干部的共性，而且具有可遗传后代的严重后遗症，这是更可怕也更可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个自信”的悲剧。

我们还应感谢邓颖超的秘书赵玮提供了重要证明。赵玮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专题访谈节目中，讲述了她在邓颖超身旁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她回忆，邓颖超在“文革”中工作非常繁重，不能很好休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要送到赵玮处，赵每一份都要认真读过，然后交给邓颖超；邓也是每份都要看过，再交给周恩来；周也是每份都看，因此，周恩来、邓颖超对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三办经手的所有专案，都是负责人，都了解办案进展情况和最终处理结果，这样，周恩来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死于专案组监护之下，更多的老干部冤死于秦城等监狱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绝不是“没有保护好他们”，而是周恩来的手上沾有“文革”中死难者的鲜血。而他只向贺龙的骨灰七鞠躬谢罪，其他死难者呢？

□ 原载《名星》第3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